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苗族 瑶族 土家族 仡佬族

(征求意见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苗族 瑶族
土家族 仡佬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苗 族.....	(1)
瑶 族.....	(16)
土家族.....	(33)
仡佬族.....	(44)

苗 族

苗族约有二百七十多万人（1957年），是我国南方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除了在贵州、湖南有较大的聚居区以外，苗族一般居住都比较分散。据各自治州成立时的统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7.9.20）有苗族三十七万多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6.7.23）有苗族近八十万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6.8.8）有苗族二十一万多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58.4.1）有苗族十七万多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52.7.1）有苗族一万四千多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分布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原名大苗山苗族自治县，1966年改现名）、龙胜各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和四川南部、湖北西南部以及上述各省（区）的其他一部分县里。大分散、小集中，是苗族在分布上的特点。长期以来，苗族在各地除了与汉族杂居外，还分别与土家、侗、布依、水、彝、壮、黎等族以村寨为单位交错居住，因此解放后建立的苗族区域自治地方，绝大

多数都采取了民族联合自治的形式，这对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得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苗族分布地区广阔，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较大。黔东南、黔南和桂北位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一千多米降到四百米左右，苗岭山脉横亘其间，河流有清水江、都柳江和盘江等；湘西、黔东北、鄂西南和川东南地区地势、海拔与黔东南地区相近，山脉有武陵山，河流有沅江和澧水。这些地区除高寒山区以外，一般来说都是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山上竹木青翠、地下宝藏丰富。除农业生产的水稻、玉米、薯类、高粱、豆类、烤烟、苧麻、甘蔗、油菜、花生、棉花以外，很多地区还盛产木材、油茶、油桐等。黔西北的漆产量为全国之冠，作为软木工业原料的栓皮栎质量为全国第一。党参、桔梗、吴茱萸、三七等名贵药材更是品质优良，畅销国内外。贵州威宁等地苗族从事牧羊，羊毛细长柔软，是毛纺工业的优质原料。黔西北的煤、铁、铜、黔东北等地的汞都早已著名。此外，钨、锑、锡、铅等的蕴藏量也很大。地处热带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还盛产橡胶及各种热带水果。苗族地区河山壮丽、资源丰富，但在解放前，由于三座大山的压榨，这里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只有在解放后，党领导各族人民战天斗地，才能使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

由于长期居住分散等原因，各地苗族的语言、名称和服饰情况比较复杂。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湘西、

黔东南、川黔滇三个方言，各方言间差别较大，以致于不同方言区的苗族不能用各自的话进行交谈。此外，在湖南城步、绥宁、广西龙胜、资源、贵州锦屏等地还有十万人说一种与当地汉语不同的汉话，在广西三江有三万多人说侗语，在广东海南有一万多人说的话与瑶语相同。解放后，语言工作者曾根据苗语方言差别较大的情况，为每一种方言都设计了一套拼音文字。由于苗、汉两族人民长期交往，据调查估计，至少有二百万人兼通汉语，并通用汉文。

各地苗族有不同的自称。湘西方言自称“果雄”、黔东南方言自称“模”，川黔滇方言自称“蒙”。各个方言内部，随着次方言、土语的差别，各地自称还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根据分析，尽管有些自称的解释不同，却出于同源。在过去由于各地苗族在服饰等方面的不同，有过“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等不同名称，也有一些称呼是反动统治阶级强加给的侮称，解放后已统一称为苗族。

苗族的服饰在各地也有较大的差别，妇女的尤为突出。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男子穿麻布衣服，并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其他各地苗族男子一般都为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长巾，冬天脚上缠裹腿。苗族妇女服饰，在县与县，甚至寨与寨之间都有各自的特点。湘西、黔东南一带苗族妇女上身着大襟右衽衣，下身穿裤子，衣袖、裤脚和衣领周围都镶有花饰。其他各地苗族妇女大都穿大领短衣，长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外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一尺二寸左右。裙面有的素净，有的有绣花、挑花、镶花或腊染。上衣的长短、花饰也各不相同。妇女盛装时还佩戴多种银饰。解放前，在服装的质量

上差别很大，地、富阶级有齐备的四季衣服，有的还用绸缎及大量银饰，劳动人民却是衣不蔽体，褴褛不堪。解放后，这种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劳动人民服装的质量普遍有了提高，为了劳动的方便，有的还作了一些改革。

苗族的节日，也有着地区的不同。大多数苗族地区都过春节，称作“客家年”。黔东南部分地区和广西大苗山盛行过“苗年”，时间在农历九——十一月的卯(兔)或丑(牛)日举行，有踩鼓、跳芦笙、赛马、斗牛等活动。有些地区还过四月八，贵阳附近几县苗族，每逢农历四月初八都穿上盛装，来到贵阳市喷水池附近，纪念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亚努。不同地区还有龙船节、花山节(五月初五)、吃新节(农历六、七月稻谷成熟时)、清明节、赶秋节(立秋)等等。解放后，对一些节日进行了改革，革除了迷信、浪费及不利于生产的习惯，而增添了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娱体育等新的活动。国庆、五一已成为苗族人民新的盛大的节日。

苗族一般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年老父母一般由幼子供养。名字有父子连名的习惯，子名在先，父名在后，但相互称呼时，都只呼本名，不连父名。由于受汉族封建宗法的影响，解放前有的苗族也制定字辈，建立宗祠，修纂家谱。婚姻有父母包办和自主两种。婚前青年男女有传统的社交活动。有些地区解放前还有“还娘头”，即舅家有优先娶外甥女作媳妇的权利及“转房”即亡夫兄弟可优先娶其寡嫂或弟媳的习惯。在新婚后，过去还有“不落夫家”的习俗，新妇结婚后，要回娘家居住三、四年到六、七年后，才到夫家长住。这些落后的习俗在解放后都已有了改变。

过去苗族崇拜多种鬼神，各种迷信活动往往造成很大的

浪费。湘西、黔东北一带因生病或求子的“椎牛”祭鬼活动，一次就要宰大水牯牛及黄牯牛各一头，并招待大批亲友吃喝三、五天。黔东南等地流行的“吃牯脏”，若干年举行一次，有复杂的仪式，要宰杀大批的牛或猪，造成极大的浪费。劳动中还有很多忌日，不能出工生产。这一切都影响了生产和生活，解放后，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群众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以后，已逐渐得到改革。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还在黔西北等部分苗族地区传播基督教，他们用杜造的“框格式”

“苗文”印刷了“圣经”，在当地麻醉和愚弄群众，并进行挑拨离间，搜集情报及剥削掠夺的种种活动，解放后，各族群众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加强了友好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改变了思想面貌。

苗族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民间文学也十分发达。苗歌通俗易懂，一般是五言体或七言体，大多只讲调而不押韵，篇幅长短不拘，有的只有几行，有的却长达一万五千行。短的一般属于抒情，长的一般用于叙事；有讲述苗族历史的古歌，控诉旧社会的苦歌、赞扬起义军的反歌，诉说爱情的情歌及歌颂新生活的新民歌等等。一般曲调比较简单，变化不大，节奏也不太严格，在保持同音度的情况下，常常随歌唱者的气量，可长可短。黔东南施洞口一带的飞歌，常为二人或四、五人的齐唱，高亢嘹亮、豪迈奔放、曲调明快，有强烈感染力。芦笙是流行各苗族地区的著名乐器，各地有些差别。此外，还有莽筒、哨呐、箫、笛、铜鼓、口琴等。很多地区的苗族青年还擅长吹木叶。芦笙舞、鼓舞、板凳舞是流传于各苗族地区的舞蹈，解放后，经过加工整理，苗族的歌舞曾出国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各地苗族的挑花、刺绣、织花、蜡染、剪纸等工艺美术也十分发达。用腊刀蘸蜡在白布上画好图案花纹后，浸入染缸染色，然后用水煮沸、脱去黄蜡现出兰底白纹图案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解放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并向国外出口。

(二)

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

关于苗族的源流，有人曾认为传说时代的“三苗”就是苗族的先人；也有人认为苗族与殷周时的“鬻”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比较确切的是，苗族先人大约在秦、汉之际已在今湘西等地的五溪地区居住，是封建史书中侮称之为“五溪蛮”或“武陵蛮”的一部分。后来，他们陆续向西南迁徙，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分布局面。叙述苗族历史的古歌中说：“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唐、宋时的史书中开始出现“苗”的名称，后来由于人们对民族识别不清，曾出现过把南方其他一些兄弟民族也称之为“苗”的现象，如把布依、仡佬等族叫作“仲家苗”、“仡佬苗”等等，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工作才予以纠正。

长期以来，各苗族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宋、元时期，湖南大部分苗族地区已是封建领主经济，而湘西腊耳山区、黔东南的雷公山区和古州山区，直到明代还处于“在深山重

溪中，不供征役，各以远近为伍”、“耕不挽犁，以钱镈发土，耨而不耘”或“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的状态。明代中叶以后，大多数苗族地区的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到清康熙、雍正以后，地主经济已在各苗族地区确立。到了近代，在发展比较先进的部分苗族地区，如湘西等地已出现拥有田地二千多亩的大地主，他们兼营榨油、染色、酿酒及桐油贩运等工商业，有资本数千银元，有的地主拥有土匪武装，并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委任，成为土匪、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土霸王，他们在当地任意欺压苗族及其他各族广大农民，造成各族贫下中农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而在其他一些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苗族是后来迁去的，他们在迁去后就受着当地土司或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如云南边境等地的苗族，直到解放前的几十年里，还一直过着“苦鸟无树桩，苗家无地方”的烧山垦荒、迁徙不定的生活。

为了反抗历代反动统治的压迫，苗族人民曾多次进行过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湘西、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满、汉族地主、官吏的压迫下，掀起了要求夺还被兼并的田地的大起义，在“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的口号下，起义军声势大增，给清王朝以很大震动。咸丰、同治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连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起义先后坚持了十八年之久，是

苗族史上斗争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此外，云南等地的苗族还参加了各地的各民族共同起义，并直接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保卫了我国的领土和主权。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湘西苗族又在1936年掀起了革屯运动，革除了清嘉庆以来，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屯田制度。1942年还举行“跳仙会”起义，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迫和剥削。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关怀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早在1926年12月，在毛主席亲临指导下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一个“解放苗瑶决议案”，号召苗、瑶族人民参加或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各地农民协会积极援助苗、瑶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苗族人民热烈参加了湘鄂西、广西左、右江和海南岛吊罗山、母瑞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军长征时，在刚进入贵州黎平县境，总政治部就通告全军，必须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在布告中指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佬的压迫”，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1934年11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苗族游击队员，向他们作了指示，在苗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红军经过的广大苗族地区中，苗族人民纷纷起来，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有的还组织了自卫队，在当地坚持了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海南岛吊罗山区的苗族人民，在1942年5月因反抗国民党匪军的迫害，而被疯狂地屠杀了一千九百多人，激起了苗、黎族人民的忿怒，组织了武装斗争，经过

三次派人寻找党的领导，终于在1944年春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在纵队的领导下，成立了五指山游击队，更好地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各地苗族人民分别参加了黔西的盘北游击队、黔东北的松桃游击队，广西的桂北武装工作队、云南的滇东南地区游击队和广东的海南岛琼崖纵队等，开展抗粮、抗兵、抗税及解放当地城镇、乡村的活动。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各地苗族人民终于在1949年冬到1950年春，先后迎得了解放军的到来，获得了解放。

(三)

解放后，各苗族地区先后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生产，改善了过去那种“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的悲惨生活。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自1951年以来，先后建立了五个州一级、十二个县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毛主席和党的关怀下，一大批民族干部茁壮成长，据黔东南自治州的统计，在区、公社两级干部中，民族干部已占一半以上。湘西自治州凤凰县的苗族地区里，区、公社的党委成员中，90%以上都是苗族。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二十五年来，在苗族地区也经历了尖锐剧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土改、合作化运动中，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利用宗族、民族关系，散布种种谬论，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在1957年整风运

动中，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更跳出来，妄图建立什么包括黔、湘、川、桂、滇部分地区在内的所谓“五省苗族自治区”的独立王国，遭到了广大苗族人民的痛斥。他们指出苗族长期以来与各族人民友好杂处，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打着“自治”的旗号，妄图分裂民族团结，脱离党的领导，破坏祖国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企图恢复解放前的剥削压迫制度，重新使苗族人民陷入黑暗、痛苦的深渊，通过反右斗争，广大苗族人民彻底粉碎了这些右派分子的阴谋。

1958年秋，苗族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刘少奇又跳出来，推行他那一套“利润挂帅”、“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黑货，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各地苗族人民纷纷抵制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起来造了走资派的反，在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通过解放后的各项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个苗族地区有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苗族人民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改革落后生产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很多地方治山治水，改变耕作制度，大规模推广双季稻，获得很大成就。黔东南自治州1973年全面丰收，粮食产量超过丰收的1971年，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雅酉公社在武陵山上筑堤拦水，既建成小水电站六座，又为旱地改水田创造了条件，现在不仅扩大了自流灌溉，农副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

械化，而且大多数农户都用上了电灯，1972年粮食总产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产量还增加了70%。广西大新县宝圩公社板价大队，文化大革命以来，连续七年大丰收，1973年粮食总产达二百九十七万斤，比1966年增加了一点六倍，现在拥有中、小型拖拉机四台，柴油机、电动机、打谷机、碾米机、粉碎机、抽水机各种农业机械六十八台，插秧机一百二十多架，还有七个小水电站，家家户户用电灯照明，犁田、插秧、脱粒、农产品加工都用上了机器，根本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和苗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努力之下，各苗族地区的工业也有了发展。黔南自治州1974年已有州、县两级的工业企业一百六十九个，比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业企业增加了58%，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远处云南边疆的屏边自治县，解放前县城里只有一盘铁匠炉，现在却有了能生产打谷机、粉碎机、小发电机等多种机器的农业机械厂，还有电力、建筑材料、制药、制茶、编织缝纫、食品加工等各种工业。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有机械、冶矿、农机、水泥、电力、化工、煤炭、造船、纺织、陶瓷、木材加工、制药、制糖、印刷等大小工厂五十一座，1972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解放初增加一百一十倍。过去只能造木船、机帆船的造船厂，现在利用大苗山的优质木材，造出了外海渔船数十艘，航行在北部湾中。随着山区水力资源的开发，中小型水电站在苗族地区更是到处开花，黔东南自治州从1967年到1973年上半年，全州十六个县共建小水电站一千一百多处，装机一千二百多台，总容量一万七千九百多瓩，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近两倍，60%以上的公社已用电力

加工、提水、照明。面对过去从未见过的敞亮的电灯，苗族人民高兴地说：“过去旧社会我们白天跟黑夜一样，现在新社会我们黑夜都跟白天一样，真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二十多年来，苗族地区林、牧、副、渔的发展也十分迅速。黔东南地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1967年开始用飞机播种造林，投资小、收益快，1974年飞机播种达七十万亩，是历史上飞播造林最多的一年。在广大苗族人民的辛勤培育下，过去要七八年才成材的杉木，现在不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砍伐使用，大大支援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林区木材运输的改进，许多过去长在深山运不出来的“困山材”，现在也都源源不断运往四面八方。盛产杉木的广西融水自治县近十多年来就上调木材三百一十多万立方米，毛竹八百五十多万根，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此外，各地还种了油桐、油茶、八角等各种经济林和天麻、杜仲、田七等各种药材。威宁自治县有四百万亩适宜放牧的草原和灌木林带，解放前由于土目、地主的剥削，牲畜缺少精料，兽疫又无法防治，因此牲畜瘦弱，繁殖率低，宽广的牧场看不到成群的牛羊。解放二十多年来，经过品种改良，疫病防治和改善饲养，牲畜头数有了迅速增长。在公社、大队的组织下，各苗族地区还开展“小秋收”活动，利用农忙空隙上山采集各种野生油料、淀粉、药材等作物，为工业原料开辟了新的途经，也增加了集体的收入。此外，其他各种副业也有了发展。

在国家的关怀下，贵昆、湘黔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对沿线苗族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过去山区的物资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又不能很快地运进来，人背

马驮，费工费时，现在火车开到了家门前，大大便利了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是，铁路直通北京城，使苗族人民感到和毛主席更贴近了。他们欢乐地唱道：

铁路修到苗家寨，青山挂起银飘带；
铁牛隆隆进山来，山区处处有大寨。
清水江畔添异彩，新建工厂一排排；
村村队队连北京，红太阳光辉照苗寨。

除了铁路以外，各地的公路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黔南自治州解放前50%的县不通公路，现在却有公路三千九百多公里，比解放前增加了十二倍，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建通车的。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邮电通讯也深入僻远的山村，大批乡村邮递员常年奔走在深山峡谷之中，不仅为苗族人民递送信件报纸，还为群众代购生产、生活用品，充分发扬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二十多年来，苗族地区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黔东南自治州的教师队伍已有一万三千人，其中少数民族的教师占了将近一半，他们在山区坚持办学，在贫下中农的管理之下，想方设法让适龄儿童上学，使得过去很少识字人的苗族村寨，现在已到处书声琅琅。在公社、大队党组织的领导下，还到处办起了政治夜校和业余文艺宣传队，据不完全统计，到1974年初，黔东南全州已有政治夜校一万三千七百多所，业余文艺宣传队一千三百多个，在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开展批林批孔，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忆苦思甜歌颂新社会等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批判了“体育无用论”以后，苗族地区各项体育活动也得到开展，尤其是女青年们，破除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大田公社追仁大队、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东风公社东风寨大队，广西隆林自治县含山大队大树脚生产队等的苗族女子篮球队都是一些坚持锻炼，搞得较好的体育队伍。

过去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流行的苗族地区，现在已是送走瘟神，换了人间。贵州紫云自治县白云公社新池大队解放前疟疾发病率高达95%， “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仅1947、1948年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因病折磨致死，是有名的高疟区。解放后，大搞爱国卫生，做到牛有栏，猪有圈，户有厕所，水井改良加盖密封，七天一小扫，半月一大扫，家庭天天扫，到1958年就基本控制了疟疾的发生和流行，1964年建立合作医疗后，培养了赤脚医生、接生员、送药员，已基本上消灭了疟疾病，成为深山苗岭里的卫生模范村，劳动出勤率经常在95%以上，生产也得到很大发展。

广大苗族人民面对二十多年的巨大变化，过去黄连苦，今日蜜糖甜，满怀着激情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海南自治州琼中县中平公社中平大队的苗族和汉、黎族社员，干部一起来到国民党1942年大屠杀的千人坑前批林批孔，他们说，林彪的复辟，就意味着苗族人民要重新惨遭过去那样的血腥屠杀，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山江公社苗族群众回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仅黄茅坪大队1947年的二百余户，七百多人中当时沿街讨饭的就有五十七户，一百七十一人，卖儿卖女的有十二户，十七人；背井离乡、逃亡外地的有三十户，六十一人；遭地主、土匪杀害的有七十人，全家被杀绝的有十